

THE ARCHAEOLOGY OF ETHNICITY

Constructing identities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族属的考古



—— 构建古今的身份

[英] 希安·琼斯 著
陈 淳 沈辛成 译

Siân Jones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THE ARCHAEOLOGY OF ETHNICITY

Constructing identities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族属的考古

—— 构建古今的身份

[英] 希安·琼斯 著

陈 淳 沈辛成 译

Siân Jones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英)希安·琼斯
著;陈淳,沈辛成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4

(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

ISBN 978-7-5325-8356-0

I. ①族… II. ①希… ②陈… ③沈… III. ①家族—
考古—研究 IV. ①K8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8429 号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独
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
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

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

[英]希安·琼斯 著

陈淳 沈辛成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6.25 插页 2 字数 197,000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100

ISBN 978-7-5325-8356-0

K·2291 定价:6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编委会

主任：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委员：刘 莉（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吴小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教授）

陈胜前（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教授）

陈 淳（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

本译丛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

（批准号：12&ZD152）

献给彼得·乌科和我的父母

在当今的考古学中，族属是一个争议极大的领域。把从考古学遗存中分辨出来的“文化”与过去的族群相对应，现在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徒劳无望的。然而，这种方法仍在考古学探索中，在现代族群和国家对各种诉求的合法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希安·琼斯认为，需要利用社会科学中有关族属的最新理论进行全面和严谨的综述，对以考古证据来重建过去族群的方法予以严格的评估。为了做到这点，她为考古学的族属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框架，以考虑族群身份认同动态和因势而变的性质。

面对族属和身份认同的重要问题，本书讨论了方法论、阐释和政治等重要问题。它为考古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卓见。

《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总序

在《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即将付梓之际，主编陈淳教授嘱我为序，我欣然同意。这主要因为长期以来，我十分钦佩陈淳教授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对科学研究的持续激情、对真理探索的不断追求、对考古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真知灼见、对传播国外考古学思想与成果的积极贡献。

陈淳教授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考古学研究生，他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师从贾兰坡院士攻读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其后又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McGill University) 人类学系攻读史前考古学，他成为新中国最早获得西方考古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之一。特别需要提出的是，陈淳教授在加拿大留学期间，深得西方著名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先生的“真传”，使他成为当今较为准确、较为全面、较为深入掌握现代西方考古学基本理论的为数不多的中国考古学家。

陈淳教授 30 多年来，一直工作在考古学教学、科研第一线。其间，他出版了《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当代考古学》、《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远古人类》、《中国猿人》、《考古学理论》、《考古学研究入门》等著作。陈淳教授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国家与文明起源研究、农业起源研究等诸多考古学重要学术领域成果丰硕，显示出其广博的学识、深厚的学术造诣。

国外长期考古学学习、研究的学术背景,国内多年来考古学教学与科研的实践与学术积累,使陈淳教授倍加关注、思考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学科现状与学科未来走向。

考古学在欧美的发展经历了 19 世纪的进化考古学、20 世纪初的文化历史考古学、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过程考古学到 80~90 年代的后过程考古学等几个重要发展阶段。在陈淳教授看来,当今中国考古学与国际考古学界发展相比,虽然改革开放后有一些理论方法的借鉴,但是国内这门学科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欧美的文化历史考古学阶段。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意见。我认为目前至少中国考古学存在不同程度上学科理论的“贫乏”、方法的“滞后”、术语“共识”的“缺失”等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些考古学者把方法与理论混为一谈,把一个世纪前已经出现并应用的考古学基本学术概念,视为新的“学说”、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我们的一些考古学研究还处于对考古学资料的“描述”阶段,人们只是在津津有味的陈述“是什么”,很少探索“为什么”。对于诸如家庭、家族、氏族、族、族群、民族、国家等不同学科的基本学术概念,缺少“共识性”、使用“随意性”是较为普遍存在的学术现象。在一些重大学术研究中,把本来不属于“同类”的科学问题混为一谈。如属于“血缘”性质的家庭、家族、氏族,与基本属于“地缘”与“文化”性质的“民族”及属于“政治”性质的“国家”,不分时代统统纳入“考古学文化”,造成学理的混乱。改变上述现状是目前中国考古学的急需,了解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成果,这是尽快深刻认识、加速发展中国考古学所必需的,是极为有益的科学借鉴。

中国考古学界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随着中外交流的频繁、增进,一些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学术经典被陆陆续续介绍到中国。如其间翻译出版的《当代国外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时间与传统》、伦福儒和巴恩的《考古

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考古学理论导论》、《考古学思想史》第一版、《理论考古学》、《民族考古学实践》和《阅读过去》等论著，他们为中国考古学发展作出了一定学术贡献。但是，诚如陈淳教授所指出的，从学科发展的更深层次、更高要求来看，上述译著的翻译质量还是参差不齐，有的不尽人意，因此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基础性学术建设。为此，他近年来翻译和推介了大量西方考古学经典著作，如：当代灵长类学缔造者约翰·内皮尔的《手》，柴尔德的《欧洲文明的曙光》、《历史发生了什么》、《人类创造了自身》、《历史的重建》和《考古学导论》，国际考古学理论权威布鲁斯·特里格的《考古学思想史》（第2版）、《时间与传统》（重译）等。陈淳教授的译著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与此同时，他还主持了《南方文物》“域外视野”栏目，在中国考古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加大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项目中，专门设置了国外著名学术著作的翻译项目。陈淳教授主持的“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当之无愧地被首次评为考古学内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

《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与此前出版的同类译丛著作相比，其译丛著作作者的权威性、著作的代表性与前沿性十分突出。译丛著作的作者多为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如《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作者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作者戈登·威利、《圭拉那魁兹：墨西哥瓦哈卡的古代期觅食与早期农业》作者肯特·弗兰纳利，还有《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作者——著名的人类学家塞维斯、《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作者——学界新锐希安·琼斯。译丛的五本书堪称在世界考古学界范围内的相关学术领域的重要著作，其内容涉及考古学学科综述、聚落考古、农业起源、文明探源、民族身份考古等五个方面，涵

盖了当今世界考古最为重要、最为关注、最为前沿的学术问题。

陈淳教授的深厚学术素养,使其在本译丛的选题方面紧扣“国情”。他认为当前中国考古学界的最为重大学术课题是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以及族属的考古学研究,这一分析是十分准确的。在此基础之上,陈淳教授《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的五部专著是从国外众多考古学著作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可以预见,这套译丛的出版会像陈淳教授所期待的那样,为我所用、中西结合,提升我国考古学界自身水平,使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少走一些弯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陈淳教授主编的即将付梓的《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是开展中外考古学学术交流的很好开始。世界考古学还在飞跃发展,新的考古学成果还会不断出现,我衷心希望陈淳教授还能不断把更多、更新、更重要的国外考古学成果,更快译介绍给中国考古学界!

刘庆柱

2014年3月21日

中文版自序

今年是《族属的考古》(1997年)出版二十周年,而考古学这门学科,也以我在本书原序中所描述的那种状况走过了一段漫长之路。在我1989到1994年的博士研究期间,许多考古学家对开发一种族属研究的新方法持否定态度,或至少是心存疑虑的。当时,那些受过程与后过程考古学影响的考古学家,将对族群的任何关注,要么看作是向早已过时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的倒退,要么看作是一种带有民族主义政治含义的危险举措。相反,那些仍坚持与文化-历史考古学紧密为伍的学者,则将这个课题看作是对他们研究根基的威胁。然而,到了1990年代中晚期,考古学家已经转向对过去政治方面的关注,并特别强调考古学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Gathercole and Lowenthal 1994; Kohl and Fawcett 1995; Meskell 1998)。那时有各种触发因素,包括“世界考古学大会”(World Archaeological Congress)(Ucko 1987, 1989)的成立,它聚焦于本学科的政治因素;还有欧洲和世界各地民族主义冲突的复炽(Kohl and Fawcett 1995)。但是其中的一项副产品就是,在让今天民族身份认同和各种努力合法化的不合时宜地尝试下,重拾考古研究对构建现代民族与古代族群之间联系的兴趣。

这些发展意味着,《族属的考古》虽有争议,却是一本恰逢其时的著作,它大体上是我博士导师,已故彼得·乌科教授的远见卓识及其洞见的结果,他先我很久就认识到这个领域的重要性。初审

在两批人之间泾渭分明,一批人对文化历史学的评述完全持敌对态度,而另一批人则对开发一种研究族属的理论框架持谨慎的积极态度,该框架挑战实在论观点(essentialist ideas)^①,并质疑把过去的族群与今天的族群直接拉上关系。在出版后的二十年里,本书一直影响很大,在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文献中被广泛引用。但是,它在英美、欧洲和拉丁美洲的考古学传统里,要比其他地方影响更为深远。这有各种原因,包括从获取本书的难易程度和语言隔阂,到考古学民族传统的特点,以及它们对新理论和阐释新方法的接纳程度(Ucko 1995)。结果是,根据考古类型学来分辨过去族群的传统方法,在世界许多地方依然故我,特别是那些拥有悠久文献或口述历史传统,并在族群名称有案可稽的地方。

为此,我对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出版由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陈淳教授翻译的中文版《族属的考古》十分欣喜。文化-历史考古学对中国考古学有着久远的影响,中国考古学也有一种浓厚的编年史学传统和将考古学文化与史籍中提及的族群联系起来的倾向(Chang 1981; Trigger 2006; von Faulkenhuasen 1993)。因此,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家一直倾心于从物质文化,诸如青铜器和葬式来分辨古代人群,比如商周和秦汉的族群(Kyong-McClain 2010)。而且,中国考古学还有一种民族主义的特点,诚如特里格所言(Trigger 1984: 359),它长期偏好一种北方中心论的编年史学,以维持一种中庸政治(centrist politics),并培养民族尊严(也见 Kyong-McClain 2010; Trigger 2006)。但是,中国考古学显然正处于一个日益强调理论创新、跨学科对话、聚焦过去的政治和公共考古学的转型阶段(桑栎 2015)。而且,中国作为一个由汉族和 55 个少数民族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其思想正向学术研

① 实在论认为任何特定的实体必须具有一批特征来表现其身份与功能。——译注。

究深入,不过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则存在不同见解(见 Mullaney 2010)。

因此,陈教授翻译《族属的考古》特别及时。我希望本书中文版的问世,能有助于中国考古学家不断反思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式,并开发新的理论方法。除了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科范围提供一种族属理论的综述外,我也希望本书能够为中国考古学家与其他学科学者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和对话,提供一点微薄的贡献。最后,我希望《族属的考古》能促进对考古研究与重建当代民族和族群身份之间关系的重新评价,并预示一种崭新公共考古学的诞生。我再次感谢为原书写作提供支持和指导的所有同仁,还有为本书翻译付出辛勤劳动的陈淳教授和他的学生沈辛成。

希安·琼斯

斯特林大学环境历史与遗产系教授

苏格兰,英国

2017 年 1 月

参考文献

- Chang, K. C. 1981. Archaeology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orld Archaeology* 13(1): 56-69.
- Gathercole, P. and D. Lowenthal (eds) 1990 *The Politics of the Past*. London:
- UN Kohl, P. L. and C. Fawcett (eds) 1995.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London: Routledge.
- Kyong-McClain, J. 2010. Barbarian caves or Han tombs? Republican-era archaeology and the reassertion of Han presence in ancient Sichua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5(2): 4-24.
- Meskel, L. (ed.) 1989. *Archaeology under fire: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heritag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Middle East*. London: Routledge.

- Mullaney, T. 2010.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桑栎,《考古学定位问题的反思》,《东南文化》2015年第2期。
- Trigger, B. G. 1984. Alternative Archaeologies: Nationalist, Colonialist, Imperialist. *Man* 19(3): 355 - 370.
- Trigger, B. G. 2006. *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nd edition).
- Ucko, P. J. 1987. *Academic Freedom and Apartheid: the Story of the World Archaeological Congress*. London: Duckworth.
- Ucko, P. J. 1989. Foreword. In S. J. Shennan (ed.) *Archaeological Approaches to Cultural Identity*, pp. ix - xx. London: Unwin Hyman.
- Ucko, P. J. (ed.) 1995. *Theory in Archaeology: A World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 von Falkenhausen, L. 1993. 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 67(257): 839 - 849.

英文版序

本书大体上基于我 1994 年于南安普顿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我的博士研究意在利用人文科学中有关族属的最新理论,来为考古学中的族属分析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当我在 1989 年启动这个课题时,除了当时已有论著中仅见的片言只语外,对这个话题几乎无人问津。很多考古学家之所以漠视族属研究,或是因为它看似为一种过时范式——文化-历史学方法的代表,或认为这是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它带有政治上的危险性。因而,在介绍我的研究课题时,我常常被质问:“这与今天的考古学到底有什么关系?”或者“你干嘛要做这个课题?”幸运的是,在困惑和怀疑几乎要让我彻底放弃之时,得益于南安普顿大学一些学者的远见卓识,我不时意识到这个课题的重要性。

五年之后,与民族主义一起,族属在考古学和社会上成了非常普遍热门的话题。在考古学术会议上,族属和民族主义成了头等议题,聚焦于如何用过去来构建当今认同的文献也呈几何级数增长。然而,考古学家们大多集中在当今认同的政治方面,考古学探究常囿于对政治的泛泛而论,并未采取逻辑步骤来反省考古学是如何解释群体认同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反省为我们提供一个较扎实的基础来解释过去的族群,那么对于当代各种群体、民族群体、土著群体和其他族群利用考古学构建他们的身份,并使之合法化的工作,我们便很难成功地参与其中。我希冀本书能为解释过

去的身份提供一种新方法,也能为如何利用过去来构建当代群体身份提供新的视角。正因有志于此,我已为我的博士论文撰写了新的引论章节,并扩充了结论,借此凸显同时考虑构建古今身份的必要性。

本书的撰写耗时甚巨,在我撰写论文和为付梓进行修改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人的建议与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我要感谢曼岛教育委员会(Isle of Man Board of Education)为我攻读博士提供资助,还要感谢罗伯特·孟席斯爵士澳洲研究中心(Sir Robert Menzies Centre for Australian Studies)提供的资助,使我得以在1990年前往澳大利亚观察土著身份的构建。当我在澳期间,伊恩和利比·金(Ian and Libby Keen)夫妇、戈登·布里斯科(Gordon Briscoe)、艾里斯·克莱顿(Iris Clayton)、雅克·兰伯特(Jacque Lambert)和许多人都为我提供了洞见与建议。我对他们在本书表述的许多观点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提供的帮助深表谢意,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大量有关构建土著身份的讨论并未收录在我的博士论文和本书之中。

感谢南安普顿大学考古系和其他学校的学者和学生,他们是蒂姆·钱皮恩(Tim Champion)、克里夫·甘布尔(Clive Gamble)、保罗·格雷夫斯-布朗(Paul Graves-Brown)、克莱尔·乔伊特(Claire Jowitt)、克里斯·洛克耶(Kris Lockyear)、布赖恩·莫利南克斯(Brian Molynenx)、蒂姆·斯莱(Tim Sly)、戴夫·惠特利(Dave Wheatley)、弗朗西斯·温班-史密斯(Francis Wenban-Smith)等,我在博士研究的过程中曾向他们求教,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个既激发思维又亲切友好的研究环境。还有南安普顿在比较方法和理论上令人极具启迪的考古学学风对我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我尤其要感谢斯蒂芬·申南(Stephen Shennan),他多年来不厌其烦地为我一遍又一遍的文稿修改提供宝贵的意见。

在为论文出版的修改过程中,本·阿尔伯蒂(Ben Alberti)、克雷西达·福德(Cressida Fforde)、安东尼·弗斯(Antony Firth)、佩德罗·弗纳利(Pedro Funari)、马丁·霍尔(Martin Hall)、理查德·欣利(Richard Hingley)、昆廷·马基(Quentin Mackie)、英格莱斯·麦克法兰(Ingereth Macfarlane)、马吉·罗奈因(Maggie Ronayne)、迈克·罗兰兹(Mike Rowlands)以及简·韦伯斯特(Jane Webster)都曾拨冗与我讨论各种问题与想法,我十分感谢他们的贡献和建设性批评。我在阿根廷拉普拉塔大学(University of La Plata)教授一门研究生课程以及在南安普顿大学教授一门关于族属和民族主义的硕士课程中,获益匪浅。非常感谢所有学生的热情和他们不时颇具挑战性的怀疑精神。我也要感谢帕克斯犹太裔与非犹太裔关系研究中心(the Parke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Jewish/non Jewish Relations)的同事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和萨拉赫·皮尔斯(Sarah Pearce),他们为本书写作提供了场地,尽管当时空间也是捉襟见肘。

感谢凯思林·诺尔斯(Kathryn Knowles)为我绘制了插图2.1、2.2、2.3和2.4。感谢巴茨福德公司(B. T. Batsford Ltd)和安妮·罗斯(Anne Ross)博士慷慨地允许我从《异教徒凯尔特人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of the Pagan Celts*)一书中截取“凯尔特人文化区与扩张”的地图。同样感谢安多弗博物馆(Andover Museum)馆长戴维·艾伦(David Allen)允许我使用“铁器时代的武士”(Iron Age Warrior)一图。这两幅图已被用作平装版的封面。感谢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和古典书局(Vintage Books)允许我从《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中引用文献。也要感谢罗德里奇出版社(Routledge)的维基·彼得斯(Vicky Peters)与其他编辑团队成员的热情帮助。